



【美】艾尔伯特·杰伊·诺克 著 彭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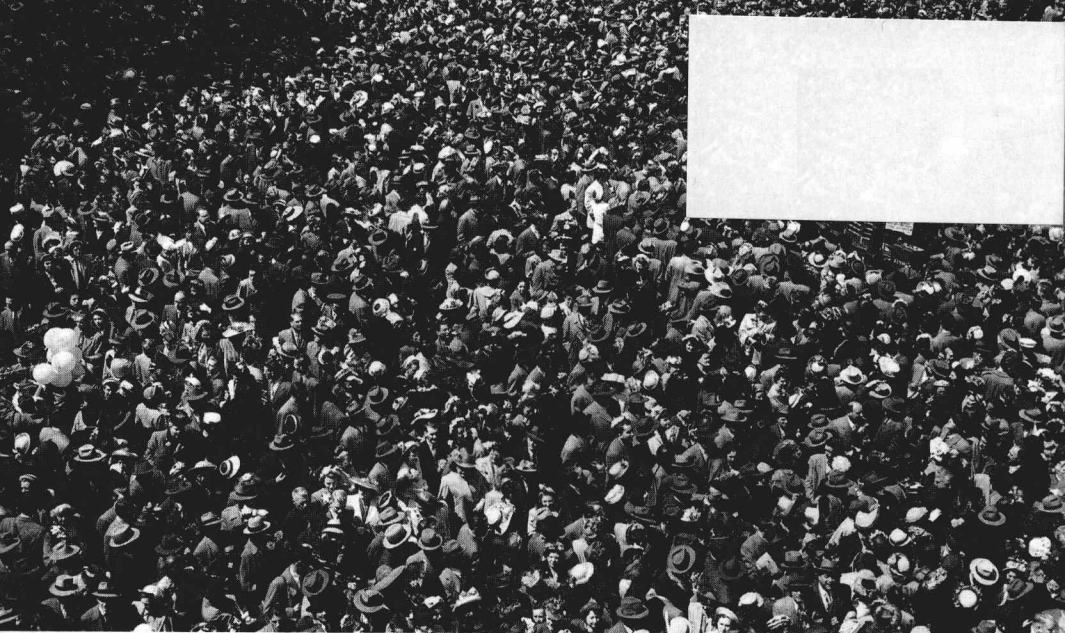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敌人：国家

Our Enemy, the State

此书也已自成体系，并且作为对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控诉而屹立着。

—— 弗兰克·秋德诺夫 (Frank Chodorov)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我们的敌人：国家

【美】艾尔伯特·杰伊·诺克 著 彭芬 译

Our Enemy, the State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敌人：国家 / (美) 诺克著；彭芬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12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 冯克利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7442 - 7

I. ①我… II. ①诺… ②彭… III. ①国家理论 - 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176 号

503701810

我们的敌人：国家

(美) 诺克著 彭芬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0.75 字数:13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7442 - 7 定价: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4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电话:0791 - 86898815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以纪念埃德蒙德·凯德威兰德·伊万斯

Edmund Cadwalader Evans

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是少数深谙国家本质的人之一



人是否生于罪、长于邪恶，我不知道，然而，我绝不怀疑，政府生于侵犯，也长于侵犯。

——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50

而今我们的文明面临的最致命的威胁是：国家的干预，任何自发的社会力量都被国家所吞噬；我指的是，那些长久以来支撑、滋养和推动人类命运的自发的历史行为。

——约西·奥特加·Y. 贾塞特 (José Ortega Y · Gasset), 1922

它（国家）承担了大量新的义务和责任；它权力的触角全面而隐秘地伸及公民所有的行动；它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宗教，赋予自身行为以宗教方能具有的尊严与情操；它的行使者跃升成为一个独立而优越的阶层，大权在握，巧取豪夺。然而，有一点从起初伊始未曾改变：它始终是所有敏锐的、勤勉的、体面的公民共同的敌人。

——亨利·L. 门肯 (H. L. Mencken), 1926



总 序

冯克利^①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做的事。首先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①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翻译家。主要译著有《民主新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致命的自负》《论公民》《宪政经济学》《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发表论文有《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刍议》等三十余篇；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和《虽败犹荣的先知》。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人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

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

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自我或互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更多的是反映在他们的共同反对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以为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通过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

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叙述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百年革命者众，而对革命回应最有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在就民族未来亟须重建共识的时代，编者愿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水，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2015年8月20日于济南历山雀巢居

译者序

诺克的《我们的敌人：国家》一书在国内并不算关于自由至上主义学派的十分知名的代表性著作，鲜有人推荐阅读。我想个中原因有多重，作为该书的中译者，看到其中一重应该是与其文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新闻记者出身的缘故，该书虽作为诺克一生的重要代表作品，也是自由至上主义学派发源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书中并未沿袭如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等著作那样的对普遍原理的系统性的推演与论证，而是如新闻稿一般将每一个例证如故事一般地浓烈地铺陈出来，令得其中国家的本质显得触目惊心。而在理论层面，诺克在简要地重述了奥本海默关于“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的区别，以及其关于国家是垄断性地施用“政治手段”的机构的理论后，推进得出国家是阶级剥削工具的结论，而且，对这个结论诺克也没有再做更深的理论论证，笔锋转而论古道今地举了历史中的国家作为例证加以分析。若阅读了洛克从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到契约论的一气呵成的理论范式，或是联邦党人精细地雕琢论证每一个制度原理，遑论康德缜密而气势磅礴地为自由进行

的规范性推演，可能会觉得书中的理论论证部分太少了，少得令我们这个被科学论证范式驯化了的时代抓狂，以至于可能不以这本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说“不科学”的书为然。这可能是国内对它鲜有关注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国家的普遍原理，唯有科学推演的范式方可得到吗？诺克在书中一再地强调他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在他的意义上，说的是通过对发源的分析，立足于历史事实，找出历史现象中共同的质素，那就是事物的本质。这是在科学化以前人类就已驾轻就熟地寻找历史中规律的方法。诺克谈到，在对疟疾起源的种种理论假设中，一直忽略了这种疾病固定的传播载体——蚊子，从而阻碍了人类发现疟疾真正起源的步伐。换句话说，这些理论太不接地气了，不接地气到忘记了一个十分显白的因素——蚊子这个载体。这里，诺克尖刻地讽刺了西方一直以来如关于疟疾起源的种种精美的理论一般的“华丽丽的”国家哲学，华美却忽略了历史事实本身，正是这一个个华丽丽的理论给西方社会编织了一个关于国家起源于社会、与社会同一的华美的幻想，这个幻想正中国的下怀，国家因此居心叵测地大肆雕琢和营销这种幻想，沉醉于理论推演的哲学家们不幸成了国家的共谋。可惜，越华美的理论离历史事实本身越遥远，而理论与事实之间过大的距离，在政治这个事件中，不仅令理论无用，甚至危险。诺克谈到，正是这些华美的理论消解了美国知识界对政治现实的辨识力，令得美国国家主义的扩展得不到任何预警。由此，可以说，诺克这本《我们的敌人：国家》的翻译出版无疑给经年累月浸润于华美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中的中国读者一个挑战：我们真有对政治现实的辨识力吗？我们是否遗忘了某些传统

的政治智慧，它们虽不科学，却洞悉隐遁于政治生活背后的质素？我们的专家中有不少成了“砖家”，真的仅仅是被利益收买的原因吗，还是我们专家们的训练模式其实科学，却不够“政治”呢？毕竟政治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但也是最复杂、晦暗的维度啊！

当然，对诺克行文风格的理解还需要考虑到一点：他和门肯所代表的是美国自由至上主义学派的发源期，在这个时期，因为刚刚发现美国自由主义正逐步背离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趋势，对于这一代学者，他们最主要的使命是发出警报，其使命是迫切且紧急的，不容冗长的理论论证，需要如先知预警人世一般，简洁、有力、一针见血，唤醒人们的警觉，而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诺克和门肯无疑是那一时代“先知”的合适人选。当然，二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通过各自的杂志发声引领了一个时代对当权的自由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叛变的反思，预警了该种叛变对美国心性 & 未来命运的影响。正是深谙自身的使命，诺克曾著文《以赛亚的职分》（“Isaiah’s Job”），以“以赛亚” 自比自己在时代中的角色。

当然，本书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立场：国家是阶级剥削的工具，国家这种垄断政治手段的机构一定会制造出两个对立的阶级——剥夺阶级和被剥夺阶级，剥夺阶级必然施用国家这种途径竭尽所能攫取被剥夺阶级的财富。中国的读者会觉得这个立场如此耳熟能详：难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国家观吗？这里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诺克的阶级观与马克思的虽然形似，却神不似。Murray N. Rothbard 在其所著关于美国自由至上主义的历史的书中梳理了诺克阶级观的来源及与马克思阶级观的区别，这里加以引介。在源流上，诺克的阶级观来源于马克思之前

(pre-Marxian) 的阶级观，主要来自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孔德 (Charles Comte) 和蒂诺耶尔 (Charles Dunoyer)。这两者曾数年教导圣西门，后者接受了他们的阶级观，圣西门在后期又将其改进为，以企业主为工人的剥削者，这种立场被马克思继承。但是，作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诺克认为，对抗性阶级是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产物，自由市场中是平等主体间的自由交换，其中不存在剥削问题，剥削是政治手段的后果，而非经济手段的后果。诺克认为市场中分配的不等，是自然秩序的结果，没有剥削可言。由此可知，诺克自然持有精英主义立场，或者说，诺克对自由放任市场的保护，其实根本是为了优秀的人群自由地生产与创造。(Murray N. Rothbar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Right*,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pp20-22.)

尽管如此，诺克的阶级观还是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共同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流派，自由至上主义认为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剥削的工具而已，国家绝非道德清白，国家与阶级对抗和剥夺共存。这与我们过去三十余年来奉为圭臬的关于自由宪政国家的神话形成尖锐的对比：不是人类社会已经觉醒了么，已经根据自由而理性的意志与智识决定订立契约组成共同体，创立公共权力，国家将会仅仅是一只被拔了牙的狮子，有权威却从此不能再伤人了吗？因此很多年，中国学界不断开给国家的药方基本主体是一味：建立如果不是欧美自由主义式的，至少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国家。然而，现在诺克这本书给了我们当头棒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国家，欧美特色自由主义国家，本质上都是剥夺阶级对被剥夺阶级的剥削机器而已。从胡佛政府到

罗斯福政府，不过是换了一批剥削阶级的具体人选。可见，诺克绝对无法赞同我们的天真：如果我们能发展出一个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诺克会说：不！到时候你们会面临新的阶级对抗的具体形式！到时候可能只是换了大企业集团借助国家来剥夺你们而已。诺克尖锐地刺破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幻景泡沫，逼迫我们从政治的实际来看待国家，可惜的是他得出了一个十分悲观的结论，就是人类对国家吞噬自由的宿命无可奈何。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的立场也仍然对我们颇有裨益：在我们的政治事业中，基于对国家的切合实际的认知，审慎地审视和抉择每一种国家行为的收益与代价。这恐怕是比继续编织自由主义国家范式的神话更为明智的方式。

本书的中文翻译是很有挑战度的。首先，诺克是新闻人士，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的作品，能游刃有余地从某一点切入贯通上至柏拉图下至与他同时代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所以，他被评价为一个“修养极高的人”（highly civilized man）。同时，作为号召大众反思当权自由主义的先锋人物，他的文章和著作修辞十分考究，使得中文译者往往感到无力将英文原著中那考究的修辞用中文表达得同样完美，在此向读者诸君表示深厚的歉意。其次，因为诺克要打破当时美国学界政治哲学不接地气、对政治现实毫无辨识和透析能力的问题，再加上作为新闻人对美国社会各种事件的熟稔程度，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美国的历史事件和他所在时代的时事事件作为案例，这无疑给中文翻译形成了又一大挑战。为了尽量准确且深度地了解其中所涉事件，译者查阅了大量的中外文文献，即使如此，仍存在那些当时占据当地报纸的头条、几十年后的今天却被历史的筛选机制遗忘的事件，因可

资考证的资料太少或者没有，译者只能采取合理推断的方式，从而留下了不够精确的遗憾。最后，因为诺克学养极高、涉猎广泛，本书的知识跨度涉及政治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要求读者具备较为广泛的知识储备。这大约是因为他以称为“余剩的人”为自己的读者，他说这部分人“性情独立、长于理智、富于求知欲”，也就是说，应当具有相应广泛的知识，所以，他书中虽有大量注释，却并非补充相应领域的知识，而是新的例证，甚至是不同领域的例证，对读者的知识广度形成更深的挑战。鉴于此，译者只能在自己所能的范围内，加以大量的译者注，为中文读者补充相应的知识，或者至少抛砖引玉引导中文读者去阅读相应的书籍，以求能尽量展现诺克这部作品的魅力。未了，译者恳请读者们体谅但不姑息译文中仍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诸位不吝赐教指正。

彭芬

2014-7-18

第二版序言

当《我们的敌人：国家》于1935年面世时，它文字的优美相比于其哲理的深刻似乎更抢占眼球。人们接受其预言的时机似乎尚未成熟，更别谈理解产生这些预言的理论基础。对传统的个人主义防线的信念似乎还未能被历史进程所撼动。宣称正是这些经济力量，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朝着吞噬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一统天下的趋势发展的论调违背了这一信仰，因此鲜有信众。即，那种“这事儿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调调成为本书难以跨越的障碍。

第一版售罄时，公共事务的发展充分证实了本书的理念。不到12年的工夫，许多美国人都见识了他们的国家也被曾统治了欧洲的哲学所俘虏。历史证明了诺克先生的理论，为此书树立了无可抗拒的口碑，做了最佳的广告，因此，当此书售罄时，读者的需求仍然十分旺盛。然而，这一版的铅板被用于战争目的。

1943年他正酝酿第二版。我就与他讨论过多次，力劝他详细阐发其经济思想，因为，我认为，针对那些仅具有有限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的